

# 女性主義方法論及對教育研究之啟示

祝若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內涵及其對教育研究的啟示。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的研究方法，首先探討女性主義知識論的理論內涵，其包括女性主義經驗論、女性主義立場論，以及後現代女性主義，而女性主義立場論視為女性主義知識論的主流。接著探討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內涵，包括女性獨特經驗視角的重要、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量化與質性方法之爭論，以及意識覺醒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最後在教育研究的啟示上，分別為研究取向善用女性的獨特視角、研究關係朝向互為主體的目標、研究方法多樣性及跨學科性，以及研究結果實踐性的重要。

**關鍵詞：**女性主義方法論、女性主義知識論、教育研究

## 壹、前言

提及女性主義方法論時，首先必須對於女性主義理論內涵與發展有一理解。西方自 1960 年代末期興起了諸多的女性主義理論，包括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基進的女性主義、馬克斯主義的女性主義、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女性主義等等，這些流派雖在歷史淵源、分析方法及主張皆有差異，但其共同目的都在於要批判與改造父權文化，以女性為主體的觀點描述與解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顧燕翎，1990）。女性主義者如 Oakley、Smart 與 Friedan 皆指出女性經驗被忽視之外，且被扭曲，關於性別主義思想的延伸，最多的研究是將男性經驗泛論到整體人類上，但此狀況從未發生在女性研究上，而是常發生在心理學研究上（Stanley & Wise, 1983）。這是第一波女性主義發展對學術界的質疑。

直到 1980 年代末期開始，第二波女性主義針對學門內之所以忽略性別議題的原因加以分析與批判，她們點出了科學中以男性為中心的現象（張華蓀，2005）。從社會學的知識論、方法論皆是依據男性經驗所建立起來的，不能反映出女性在社會世界的獨有經驗，因此女性主義期望藉由特定的主體（女性主義者）來參與外，並運用新的理念與工具，也就是透過女性主義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的變革來達成目標。

由女性主義來審視過去傳統的教育研究上，發現到常忽略了性別變項的考量，將男性與女性視為一致的研究對象，而未考慮到其差異性。如謝小岑與楊佳玲（1999）回顧解嚴以來主流教育研究中的性別論述，亦發現早期對婦女成人教育的文獻無視於現實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事實，不反省或批判父權的性別價值觀，也不碰觸兩性差異的社會文化中的結構因素，她們稱此為「性別盲論述」。但近年來女性主義的風潮逐漸在台灣的影響日漸擴大，根據謝小岑與楊佳玲（1999）蒐集 1990 年以前與之後有關台灣性別教育文獻，發現期刊與論文的數量皆有明顯的增長。雖然由上可知台灣的女性主義研究已有相當的發展，但正如潘慧玲（1999）所說，國內與性別相關的教育研究大都偏重在現況的探討、批判與省思上，其他諸如女性認知發展與學習、女性學習方法與策略、女性知識論的研究都較為缺乏。另外在方法論上也有所缺失。像游美慧（2004）將學術期刊論文題目或所列出之關鍵詞中有「性別」一詞挑選出來做檢視，發現這些論文都是有名無實：雖有性別之名卻無性別分析之實。或是潘慧玲、梁文葵與陳宜宣（2000）在檢視教育領導碩博士論文，發現性別雖進入研究者的場域，但作為探討的變項時，通常僅具有附加價值，研究者常忽略檢視自己所用的理論，是否具有多元觀點的正當性之一，使得女性聲音隱而不彰。

綜上所述，雖然近年來在教育領域上的女性主義研究，其議題與論文數量皆有大幅的增加，但多半停留在西方第一波女性主義階段甚至缺乏性別意識。所謂的「性別意識」不單只是呈現女性的生活面貌，是要看研究是否顯現性別上的權力關係，是否能揭示在制度習俗、語言象徵與實質生活等面向上的性別偏見或歧視（引自張華蓀，2005）。因此研究中的性別意識上，其牽涉到切入分析的視角，需深入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內涵，以及其背後支撐的知識論來做探討。

承上所述，本文透過文獻探討的研究方法，首先探討女性主義知識論的內涵，以此為基礎來探究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內容，最後分析女性主義方法論對教育研究的啟示。冀望透過本文釐清女性主義知識論與方法論，提出對教育研究的研究觀點與研究方法，進而解決教育研究中性別論述方法論的缺失。

## 貳、女性主義知識論

在探討女性主義方法論的意涵之前，必須先對女性主義知識論做一說明。因為如果只是要求方法論之精進，而不思索內在知識建構所牽涉的權力問題的話，研究只不過是一個異化的生產勞動，且研究只是將探究技術與理論觀點操弄精確的知識／權力論述遊戲（游美慧，2004）。因此必須探討女性主義對知識論獨特的思維論點。故下列本文先說明女性主義對傳統研究的批判，接著再陳述有關於女性主義知識論的內涵。

### 一、女性主義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批判

女性主義者批判傳統社會科學研究論述的文獻甚多（Harding, 1986; Pamela & Claire, trans. 1995; Stanley & Wise, 1983; Stanley, 1990），透過女性或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來探究不同的現象，由性別的觀點作為出發點，進而批判研究視角的單一侷限。以下茲就說明之。

#### （一）實徵主義排除女性的觀點與研究

傳統的實徵主義雖然宣稱客觀中立，但過去女性卻排除於相關實徵研究之外。若研究問題的提出、現象的解釋，都是由居於宰制位置的男性立場與標準為之，就不見得能免於片面、荒謬的理解，使科學問題的指認與定義本身，仍是社會偏見的主要來源（引自張華蓀，2005）。換言之，在父權體制下的研究社群，以主流價值為主，忽略

或扭曲了女性的經驗，以致於女性研究常處於被消聲的處境。

### (二) 科學中客觀中立的迷思

孔恩 (T. Kuhn) 認為邏輯實證論重視各種適時的可驗證性，其似賦予科學相當大的客觀性，但是科學仍有主觀的一面。某種知識之所以被視為科學知識，其實是反映了當時所處科學社群既有的概念 (或偏見)，而科學家常自以為客觀、中立接受證據，事實上，這些證據背後已有既定的典範概念所框住，當出現異例時，科學家通常會加以漠視 (簡成熙，2003)。這種異例有可能是因性別的差異而造成的時候，女性主義認為這是以男性觀點與價值觀卻打著價值中立之名的科學與哲學史，故應重新審視與再評價傳統的知識觀與科學觀，進而積極對「S 知道 P」這個知識論命題形式的批判，重新建構由女性主義觀點的知識論與科學哲學 (引自李嘉齡，2002)。綜上所述女性主義對傳統研究的批判，過去所稱的科學中立都具有爭議，其中存在著男性中心的普世價值，漠視與忽略女性經驗與立場，因此女性主義者認為必須由女性的角度來進行更多元的理解。

## 二、女性主義知識論的內涵

Sandra Harding 為女性主義知識論中最有系統的論述分析者，她將女性主義知識論視為女性主義研究中合法性的證成策略，包括誰能成為研究的主體、什麼樣的信念可成為知識的合法性、質疑主觀性的真理能被當作知識等 (Harding, 1987)。Harding (1987) 將女性主義知識論界定為三種型態：女性主義經驗論 (feminist empiricism)、女性主義立場論 (feminist standpoint)，以及後現代女性主義 (feminist postmodernism)。以下茲就這三種論述的內涵加以說明。

女性主義經驗論認為社會偏見是由錯誤信念所導致，包括盲目崇拜、習俗、愚昧或缺乏教育，這些偏見有可能進入到研究設計、資料的蒐集與解釋等，進而導致研究結果的扭曲。此理論揭開了女性主義社會學早期的性別歧視，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或消除研究過程與結果的男性中心主義偏見，甚至認為婦女運動也為了更多的女性或女性主義研究者創造了機會，並且更容易產生無偏見的知識 (Harding, 1987)。雖然這種證成策略只對傳統知識論的不完善實踐方式提出批判，但是對於現有的方法論仍抱有認同的態度。

女性主義立場論認為認知者的位置會影響到知識的產生，各種知識的證成或聲稱，都是「處境的」(situated)、認知主體 S 的社會位置會去決定其所要接受的 P 證成

的程度（引自簡成熙，2003）。因此立場論認為知識是以經驗為基礎，其理論優越之處在於他們本身源自於女性的生活經驗，這種經驗為產生更加完整與更少扭曲的知識提供了潛力。但這樣的經驗並非隨意運用（Harding, 1987）。如 Stanley（1990）所說經驗是未加工的（raw），必須經由批判的理論化才行。立場論認為因為女人處於被統治、被忽略、被邊緣化的「他者」位置，這使她們具有一種異於男人的批判眼光或立場，有助於克服偏見並產生更客觀的知識。立場論者對傳統知識論所主張的價值中立的客觀性原則持批判態度，強調認知過程的社會性與主體性，堅持女性立場與經驗的價值取向的重要性，但他們並不是如女性主義經驗論所謂的遵循現有的方法論規則，在過程中更加嚴格或是更少出錯，而是進一步明確提出尋求一種具有反思性獨特的女性主義方法論。

後現代女性主義已偏向女性主義相對論（feminist relativism），他們開始懷疑是否真的存在著一個「在那裡」等著被知道的世界或一組社會結構（Pamela & Claire, trans. 1995）。他們批判啟蒙思想所推崇的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所謂「宏大敘事」，認為女性主義所能做的是讓來自不同種族、階級與文化的女性能講述自己的故事，呈現出她們擁有的不同經驗和她們的不同需求。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知識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情境化」，沒有不含偏見的知識，也不存在一種壓倒一切占絕對優勢的知識形式，只有多樣化的支離破碎的主體所講述的多種多樣的故事。可以看出，這種證成策略強調知識的建構性與多元性，一定程度上為相對主義打開了大門。

綜上所述，這三種型態的理論並非壁壘分明，有著許多共同的強調。大體上，女性主義立場論是知識論的主流。Harding 提出了立場論，強調「女性立場」的觀察與理論創發之重要性，並非是要把科學從男性的認知中還原，回復到中性客觀，而是透過女性主義的反省，認知到主體是如何巧妙的潛藏在科學研究中，進而才有擴大科學視野的可能性。換言之，這種觀察與立論建構上的「立場」，Harding 認為，既非只是重複「啟蒙理性」的觀點而已（如說女性比男人觀察更仔細、沒有偏見），因為這種基於「性別差異」的立場優點，與啟蒙的「普遍」理性不同；但「立場論」也不是「反啟蒙」的後現代觀點，因為立場論可以說是一「更好」的知識論，而不掉入相對論的立場（Harding, trans. 1992）。女性主義立場論所抱持的女性獨特經驗理論，也成為了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立論基礎之一。

## 參、女性主義方法論

女性主義方法論一詞曾引起許多爭議，相較有人極力主張，但也有人認為根本沒有所謂的女性主義方法論存在（游美惠，2004）。Harding 認為原因之一在於人們往往將方法、方法論與認識論問題糾纏在一起，而沒有認識到它們之間雖然有複雜的關聯，同時卻是相互區別的。方法是指蒐集研究資料與證據的技術；方法論是用於分析與說明研究如何進行或應該如何進行的理論；知識論問題則討論有關知識有效性的理論與證成策略。女性主義在討論方法或方法論問題時，往往將這三個方面混雜在一起，缺乏清晰的概念，結果不能釐清何謂女性主義社會研究最獨特的東西（Harding, 1987）。關於女性主義方法論的文獻資料甚多，因此本文將女性主義方法論整理歸納為四項範疇，包括女性獨特經驗視角的重要、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量化與質性方法之爭，以及意識覺醒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 一、女性獨特經驗視角的重要

傳統社會科學研究是以男性經驗為出發點，只關注到男人所重視的社會議題，甚至僅從資產階級白人男性的視角出發，定義哪些社會現象需要解釋的問題，其結論必定是偏頗的且不公平，因為男性獨特經驗視角並不能全然顯示出女性的經驗（Harding, 1987）。因此 Stanley 與 Wise（1983）認為女性主義研究是蘊含且產生女性主義意識（feminist consciousness）的研究，正因為如此才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女性主義意識的產生涉及到女性從意識覺醒活動（consciousness-raising activities）中獲得新的理解（Stanley & Wise, 1983）。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自於女性獨有的具體的日常生活經驗之中，因為單從男人的觀點是片面且扭曲的，而女性主義的觀點就像是無產階級的觀點，能暴露出男人看事情方式的虛假，這樣的經驗具有「被支配者的經驗」而非支配者的經驗（Clough, trans. 1997）。故 Stanley 與 Wise（1983）提出女性主義意識歷經三個階段：錯誤意識、意識覺醒與正確意識。這三種並沒有明確的開始與結尾，女性主義意識是一個螺旋型的過程，在錯誤意識中，女性從看不到或不知道女性是受壓迫的，轉而隱約感覺到存在某些問題；意識覺醒中是女性對自己的生活的認識發生轉變，使她能以一種新的、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與認識事物，但仍用自己舊有的觀念與行為模式；正確意識則意味著她在日常生活中，能用每個女性都具備的力量－「女性主義的實踐」。故女性主義意識拋棄男性霸權下關於女性角色的觀點，培養出一種自我、他人與

「社會實在」的新的意識 (Henderson, Bialeschki, Shaw & Freysinger, trans. 2000)。

Harding (1987) 也提出一論點「新的經驗與理論來源：女人經驗」來證明女人經驗對女性獨特視角的重要性。因為單從男性經驗來談論是偏狹的，故女性主義研究的特點之一，是從女性經驗的視角來作為研究的出發點，這樣的女性經驗是多元化的，它來自不同的階級、種族、文化女人的日常生活經驗，這也成為女性主義見解的豐富泉源。另外女性經驗的特徵也在於不僅是「注重具體的日常生活」，而且在「與他人及自然相處時，能感受到多樣的相關性與連續性」(Clough, trans. 1997)。

綜上所述，女性主義方法論中重視女性獨特經驗視角的主張，不難看出這點是由女性主義立場論而來，因為立場論認為知識是以經驗為基礎，女性主義意識與女性經驗比過去傳統研究是以男性的經驗更加完整且較少扭曲，並堅持女性立場和經驗的價值取向的重要性，由上述可知，女性主義研究者強調女性獨特經驗視角，其不僅是由女性主義立場論的理論所得來的，亦是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立論基礎。故研究中若能從女性經驗與女性主義意識醞育且發展，才能構成不同的研究視角看待世界。而女性主義者雖然強調其獨特的方法論或研究視角構成了女性主義研究，使其能區別於非女性主義研究的基礎，但並不主張自己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有什麼特別之處，而是宣導方法的多樣性與包容性。如同 Harding (1987) 指出，女性主義研究者可以運用傳統意義上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只不過其運用的具體方式可以有所不同，這些對熟悉的研究技巧的不同運用，依賴於新的方法論和認識論。換言之，她認為不存在獨特的女性主義研究方法，只存在獨特的女性主義方法論和知識論。另外 Harding 認為，男人只要堅持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準則，也可以從事女性主義研究，換言之，在 Harding 的立場論中，認為「男人」女性主義的立場是有可能的 (甯應斌, 1997)。故從女性立場出發並不意味著將女人的特殊經驗普遍化，或者只是代表了女人之間共有的觀點，而是為過去傳統研究中缺席的主體和經驗，創造了新的空間。

## 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女性主義認為傳統的研究，是將被研究的人當作操作的物體，研究者只是運用那些研究來實行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符合被研究者的需要與願望，因此以女性主義的立場來看，研究並非個人的研究，研究者要幫助參與研究的女人去進行他們的研究，讓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一起來決定研究目的、研究步驟、甚至運用研究成果，如此一來讓被研究的女人（或男人）被「聽到」，才有可能從研究對象的立場來看、去理解世界

## 女性主義方法論及對教育研究之啟示

(Pamela & Claire, trans. 1995)。如同 Cook 與 Fonow (1986) 認為女性主義社會學研究的特徵之一，在於考察研究過程的倫理關係，並能預見研究結果對被研究者的影響，確保被研究者可得到他們所需要或想要的資訊。

另外 Harding (1987) 認為研究者自身的權力關係也應有所改變，她提出「將研究者與公開的研究主題放在同一個批判水平上」，也就是研究者本人的階級、種族、文化、性別假設、信念與行為等，必須置於她或他所要描繪的框架中，這樣一來研究者對我們來說，不是以一個無形的、匿名的、權威的聲音出現，而是表現為有具體的、特定的欲望與利益的真實的、歷史的個體。

質言之，女性主義認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應該是以整合、平等甚至是合作的關係。透過上述的關係，被研究者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並讓研究者學會傾聽與書寫。

### 三、量化與質性方法之爭論

女性主義者一直以來都對量化研究有所批判，除了上述所說「實徵主義排除女性的觀點與研究」，其在於量化研究是隱藏著性別偏見。例如研究樣本中帶有性別歧視或者根本不包括女性，以及研究問題不適合女性等。另外女性主義者對量化研究本身的方法論特點也有所批判。如研究者常常只透過問卷或其他文字來當作媒介與被訪者交流，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距離，因為量化技巧而不斷擴大，以致於很難產生有用的理解 (Cook & Fonow, 1986)。因此女性主義認為量化研究使得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容易形成一種控制與統治關係。於是許多女性主義者倡導必須透過質性的研究方法，包括俗民誌、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口述史 (Morley, 2000; Reinharz, 1992)。Morley (2000) 認為俗民誌最能代表女性研究的方法，其強調經驗、批判反思的重要，以及紮根理論的價值。

然而也有女性主義者質疑偏重質性的研究方法，認為質性研究仍有偏見的侷限，例如被研究者在非結構式訪談或開放式訪談下，更易受到研究者的偏見和觀念的影響，這些偏見以更加微妙和不易察覺的方式起作用；另外質性方法上很依賴被訪者的語言表述能力，此很容易導致研究者的誤解；並且質性研究使得事後的反駁或檢驗變得異常困難等等 (Ryff, 1985)。

Sprague 與 Zimmerman (1989) 則認為質性方法不一定能打破研究中的權力控制關係，反而每一種研究方式都是一種建構，都存在著偏見，這樣的偏見在任何觀察中都

是無可避免的，量化的研究者必須批判地、謙虛地閱讀質性研究的文獻，而質性研究者亦是，沒有一個單一的方法可提供最滿意的答案，必須透過兩者的整合來重建女性主義方法論。

綜上所述，女性主義者認為量化研究使得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容易形成一種控制與統治關係，僅是把被研究者當作操作的物體，研究者運用研究來實行自己的目的，忽略了被研究者的需求及願望。在這樣的情形下，女性主義者特別關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故藉由質性研究，不僅研究者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且能建立彼此的信賴關係，但也就是這樣的親密關係，使得質性研究比量化研究更容易造成偏見與誤解。在此爭論之下，Sprague 與 Zimmerman (1989) 認為每一種研究方式皆或多或少隱藏著偏見，因此唯有透過兩者的整合才能重建女性主義方法論的樣貌。

#### 四、意識覺醒與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Ramazanoğlu 與 Holland (2002) 探討女性主義方法論中權力與知識的關係，因為權威式知識產生的權力並非平等開放給全部的人，女性主義認為權力製造差異，誰有權力去知道什麼，或是權力如何牽涉於知識產生的過程。在這樣權力分配不均的情況下，Cook 與 Fonow (1986) 認為研究應重視喚醒人們意識思想的啟蒙上，提高意識覺醒的可能性，承認研究者的女性主義意識對研究的影響，把社會變革作為研究進程的目標之一，並且強調女性的賦權與女性命運的變革，透過致力於研究，使其結果有助於改變女性，在生活中受壓迫和受剝削的處境。Stanley 與 Wise (1983) 亦提出從女性主義視角作的研究不能只當作是一種描述，而應當引起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換言之，研究必須帶出解放的知識，來幫助受壓迫的弱勢提升意識，此具有實踐的意味，期望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對生活世界有實質的改變。

### 肆、女性主義方法論對教育研究的啟示

上述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內涵，可對目前教育研究做一啟示，其整理分析五項範疇，包括研究取向善用女性的獨特視角、研究關係朝向互為主體的目標、研究方法多樣性及跨學科性，以及研究結果實踐性的重要。以下茲就說明之。

## 一、研究取向善用女性的獨特視角

Reinharz (1992) 在女性主義的研究方法上，曾指稱女性主義是一種「視角」(perspective)，而不是一種方法 (method)，其視角在已知探究領域中現存的方法或發展創新的方法，其意味著在社會研究方法有多元的女性主義視角，女性主義研究者重視女性經驗與其他個人或社會範疇交織在一起。故女性研究的範疇包括探究女性主觀經驗與她們的解釋，其結果往往能破解社會迷思而引發新的理論框架發展，或是研究重視女性人際關係與互動，凸顯女性處在日常語言及對話結構中的男性掌控特質，以及關注性別與社會階層之交互影響內涵 (引自李嘉齡，2002)。

由女性獨特視角來應用於研究過程與方法上，女性主義社會學者 Smith (1987) 運用制度民族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的方法，幫助女性從自己的位置出發去理解她們所處的社會世界，此方法是做為研究者的女性本身是邊緣群體的一份子，所以她們從邊緣立場出發，向外擴散到社會權力與統治的中心，並闡明影響具體情境統治的可能性，這樣研究的目標期能透過由日常世界中活生生的個體經驗，來揭示組織現有統治秩序的社會關係，由此可看出制度民族制提供了由「個人」走向「政治」，以及理解制度因素對個體生活影響的方式 (Smith, 1987)。換言之，Smith 批判社會科學研究通常是以文本論述的媒介出發，但卻忽略了經驗與經驗主體，以致於研究結果皆顯示過於抽象的論述 (游美惠，2004)。因此制度民族誌善用女性觀點，此觀點特別指涉一個依賴私人領域及公共領域分離的分工，也就是說，沒有其他觀點能像女人觀點一樣，特別是將女性日常生活世界作出發點，並與外在的多種制度相聯繫，例如工作、教育、家庭生活等制度有關，為抽象概念賦予一種具體形式的實際活動。

另外在研究書寫過程中，Devault (1999) 在《解放方法：女性主義與社會研究》一書中探討，如何從女性立場出發談話與傾聽、書寫與修辭的方法技巧。她認為傳統的社會學研究過程中，女人的談話往往被視為閒話家常或瑣事的表達，故被排斥在外，而這樣的排斥與貼標籤，實際上是控制女人與她們對公共語話的貢獻機制。在與女人訪談過程中有一些顯而不見的細節，或是經驗與互動提供分析的線索，這些意義都是過去容易被忽略的，因此她認為必須要從女性立場來檢視女人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然而描述女性經驗時，不論研究者採用什麼收集與分析訪談資料的方法，都可能面臨誤貼標籤的危險，故研究者應精準的選擇言詞，並注意到選用這些言詞對經驗描述的結果，故女性主義文本應超越標準語詞的方式描述女性的生活過程，並以女性個體視角的有效性來取代抽象的、標準化的知識主張 (Devault, 1999)。

由女性獨特視角出發可廣泛應用於教育研究的場域中，首先重視女性主觀經驗及其解釋，以及關注女性人際關係及互動來作出發點。但誠如游美惠（2004）所說，由於攸關性別議題，研究的脈絡情境性價值就應受到檢驗，但過去討論性別差異時卻忽略這一點。故為補足此限制可運用制度民族誌的方法，拋棄抽象的文本概念，著重由具體日常世界中活生生的個體經驗，並擴大至外在的多種制度。

另外在研究書寫過程中，由女性獨特視角可重視研究訪談中枝微末節的細節或互動等，或是檢視女人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例如卯靜儒（2006）「我們如何研究女性教師的性別經驗與意識：一種女性主義觀點的後設分析」，作者透過學術論文的分析探討女性教師的研究、了解與分析之類的知識生產的研究歷程，最重要的是作者試著從女性和語言的關係說起，以解釋為何生命史、生命故事、生命敘說，或者訪談是這些論文主要的研究方法。這中間是有某些（隱晦不明）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在影響。由上述研究可知，由女性主義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觀點重新審視女性與語言的關係，並發覺有些研究方法隱藏著隱晦不明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也許正是因為這些未被正視的問題作用其中，導致影響所謂實踐的力量或知識生產的權力效應有削弱或增強的效應。故研究者不分是男性或女性，從女性的獨特思維出發，或是男性研究者亦可以由自身的經驗貢獻更多的觀點，無論是在資料蒐集、研究過程或是結果的解釋，可以發覺性別差異的隱而不顯，或是批判現有的知識生產工具，以及關注女性經驗的研究實踐。

## 二、研究關係朝向互為主體的目標

Reinharz（1992）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提出兩項研究方法，包括注重研究者的個人參與特質，以及重視被研究者的參與。換言之，女性主義方法論在教育研究的過程中，能先以個人經驗作為出發點（不論是研究者或被研究者），同時打破個人／私下與公共／客觀等二元分類，並且研究關係能朝向互為主體的目標，尋求合作的關係。

事實上女性主義研究特別重視研究者與主體間的密切關係，試圖建立起兩者之間的情感與信賴感，這在女性研究中的重要性有時往往超越了研究本身，這種持久密切的關係，也成為一種研究洞察力的基礎。另外女性主義的研究者重視讀者的參與（Reinharz, 1992），希望讀者能瞭解她們研究背後的意圖與發現，並邀請讀者一起用分享的心情來體會其他女性的經驗。因此以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發展趨勢來看，質性研究更能承認研究脈絡的重要，尋求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合作關係，上述特質也使得

民族誌、紮根理論成為熱門的使用方法（李嘉齡，2002）。例如陳麗華、王鳳敏與陳烘玉（2003）「互動俗民誌取向之社區行動課程：『金山國小』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之研究」，採取「互動俗民誌」的研究取向（Interactional Ethnographic approach），於九年一貫課程架構下推動「互動俗民誌取向之社區行動」課程方案，在「課程統整」、「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三大重要內涵中，以學生為主體，將社區議題融入學校課程，將可使學校本位課程呈現更多元風貌。雖然上述研究不是以性別議題來作為研究，但更清楚說明透過俗民誌的研究方法，強調以被研究者為研究主體，並重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合作關係，可廣泛運用至教育研究的各領域。

另外女性主義研究希望擺脫將研究對象客體化的缺點，期望能朝向互為主體的目標，並希望研究者對性別偏見能敏銳察覺之，如游美慧（2004）檢視有關性別議題的文獻結果中，可發現到學術論文將母親或已婚婦女客體化與問題化的研究不少；另外一研究是探討母親的兒童學習信念，與兒童的學習成就關連作一調查，但發現緒論、文獻探討與結語是以「父母親」來探討兒童的認知發展，但在抽樣調查卻只限於「母親」。事實上，在研究過程與設計上，研究者常會忽略了習以為常的性別偏見，造成許多性別不平等的雙重標準，巧妙地隱藏在於研究之中。因此在教育研究中，應提高自身對性別敏感度，以及時時檢視研究中的性別適當性與特殊性。

### 三、研究方法多樣性及跨學科性

Reinharz（1992）認為女性主義的研究方法，應採取多樣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具有跨學科性（transdisciplinary）。如同上述女性主義方法論在質量之爭所述，每一種研究方法都可能存在偏見或限制。因此在教育研究上，不強調方法上的菁英主義或單一正確的方法論。另外必須注意到多角度的資料蒐集，包括歷史、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生物、心理等面向，這種跨領域性的方式，研究者如同相互關連的求知者（connected knower），找到學科之間的橋樑（Reinharz, 1992）。

尤其近年來外籍配偶在台灣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研究是針對外籍配偶而做。包括原本國家的性別文化、跨國文化的衝擊、新台灣之子的母親角色，以及外籍配偶對子女教養態度的研究。例如蘇容瑾（2004）「外籍配偶對母職之角色覺察與子女教養態度之研究」，兼用質性與量化研究法，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探討外籍配偶對母職之角色覺察情形；在量化研究，為便於對照，研究者自編「子女教養態度問卷」分別對 58 位外籍配偶及 102 位本國女性配偶實施調查，比較兩國的差異。另外像是賴文彥（2006）

「性別角色態度變遷與外籍配偶現象之關係」，研究方法主要為量化研究且採取全國性的資料分析，係研究資料是根據內政部「92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資料來分析迎娶外籍配偶之本國男性的社經地位，進一步與台灣配偶男性做比較；另外，賴文彥也參考「第四期第三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來探討兩性性別角色態度的變遷與影響性別角色態度的關鍵因素，以了解娶外籍配偶之本國男性的特徵與兩性在性別角色態度上的差異。由上述兩種研究來看，針對近年來性別研究範疇的複雜多樣，研究方法不僅趨於多樣性，且重視多角度的資料蒐集。

#### 四、研究結果實踐性的重要

Reinharz (1992) 認為女性主義研究的目的為創造社會的改變。換言之，女性主義的研究最終目的，在於能實踐研究結果，以期完成改變社會的責任。例如洪久賢(2001)「教師性別教育專業成長之分析研究」，作者主要透過性別教育成長團體的互動與對話蒐集，深層檢視性別角色社會建構歷程，促使成員得以自我突破、重新定位，並感受到彰權益能，進而建構多元文化價值觀，此研究屬於性別意識的實踐性探究的行動研究。

然而在游美慧(2004)檢視性別議題的研究時，卻發現文獻在建議的部分，通常只關心研究工具可以如何的精進、可以再將同一套研究方法與步驟施加哪些人身上，或是研究對象可以如何再被操弄以便可達到最佳的實驗效果，在研究中的女性對象消失了，是否對研究對象提供良善的具體措施及建議亦無說明。質言之，研究問題與研究對象並非處在真空狀態，皆是在社會時空狀態下所形成，因此得出的研究結果也必須能在社會脈絡裡實踐，這研究才得以有價值。

### 伍、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內涵，以及其對教育研究的啟示。本研究首先說明有關女性主義知識論的內涵，先陳述女性主義對社會科學的批判，歸納為實徵主義排除女性的觀點與研究，及科學中客觀中立的迷思。再來探究女性主義知識論的內涵，其包括女性主義經驗論、女性主義立場論，以及後現代女性主義，而大部分是以女性主義立場論作為女性主義知識論的主流，以此抱持的女性獨特經驗立論，也成為了女

## 女性主義方法論及對教育研究之啟示

性主義方法論的立論基礎之一。接著探討女性主義方法論，經整理歸納四項範疇，包括女性獨特視角的重要、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量化與質性方法之爭論，以及意識覺醒的可能性。承接上述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內涵，最後針對教育研究的啟示上，分析並整理四項要點，分別為研究取向善用女性的獨特視角、研究關係朝向互為主體的目標、研究方法多樣性及跨學科性，以及研究結果實踐性的重要。

在女性主義方法論上，確實也有紛爭與理論弔詭之處。紛爭在於有沒有女性主義方法論之詞，有沒有獨特的方法論或研究方法，至今仍爭論不休。在理論弔詭之處在於她們宣稱價值中立是不存在的，認為偏見是無可避免，但另一方面卻又以追求更少的偏見客觀性作為目標。故女性主義者 Antony 曾說偏見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存在，女性主義並非是要取代傳統的知識論，而是要提供另一種視野（偏見）（引自簡成熙，2003）。但女性主義研究仍會讓人有含糊不清且曖昧不明的態度，雖然如此，女性主義研究之所以具有價值，如同 McDowell 所說：

（女性主義研究）肯定女性的經驗、想法與需求...其目標是為了能以某些方式改善女性的生活、是為了在解放上有所貢獻。...其所涉及的是**重新思考你看世界的觀點**，需要開放而誠實地面對你的感覺和恐懼，並將你自己的生命與研究過程整合起來（引自張華蓀，2005；McDowell, 1988）。（粗字體為作者所加）

承上述，女性主義研究是可以挑起你對世界觀點的重新思考。相同地，女性主義方法論是可以重新思考男性權威支配的知識世界，藉由女性主義的觀點思索，在教育研究上，挑戰許多傳統學術的研究歷程，省思傳統研究方法與過程是否運用適當，進而發揚多樣化的女性經驗主體，讓知識生產能有創新元素和思索多元的議題。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份

- 卯靜儒 (2006)。我們如何研究女性教師的性別經驗與意識：一種女性主義觀點的後設分析。《教育研究》，147，68-79。
- 李嘉齡 (2002)。教育研究中的女性發聲：以碩博士論文為例。《人文與社會科學教學通訊》，12 (5)，91-110。
- 洪久賢 (2001) 教師性別教育專業成長之分析研究。《師大學報：教育類》，46(2)，213-231。
- 張華蓀 (2005)。蝸行 20 年：女性主義地理學在臺灣的發展。《地理學報》，(42)，25-46。
- 陳麗華、王鳳敏、陳烘玉 (2003)。互動俗民誌取向之社區行動課程：「金山國小」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之研究。《教育資料與研究》，(55)，16-27。
- 游美惠 (2004)。從方法論的要求到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追求－檢視教育研究期刊中的性別論述。載於潘慧玲主編，《教育研究方法論：觀點與方法》(頁 371-400)。台北：心理。
- 甯應斌 (1997)。女性主義立場論的一些問題。刊於國科會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
- 潘慧玲 (1999)。教育學發展的女性主義觀點：女性主義教育學初探。載於台灣師大主編，《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台北：揚智。
- 潘慧玲、梁文蓁、陳宜宣 (2000)。台灣近十年教育領導碩博士論文分析：女性主義的觀點。《婦女與兩性學刊》，(11)，151-190。
- 賴文彥 (2006)。性別角色態度變遷與外籍配偶現象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嘉義。
- 謝小岑、楊佳玲 (1999)。教育研究中的性別論述：十年來台灣性別與教育的文獻回顧。論文發表於邁向 21 世紀兩性平等教育國內學術研討會。高雄：高雄醫學大學兩性研究中心。
- 簡成熙 (2003)。女性主義的教育哲學。載於邱兆偉主編，《當代教育哲學》(頁 209-246)。台北：師大書苑。
- 蘇容瑾 (2004)。外籍配偶對母職之角色覺察與子女教養態度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台科技大學技職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台南。

## 女性主義方法論及對教育研究之啟示

顧燕翎 (1990)。《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

### 外文部分

- Clough, Patricia Ticineto (1997)。《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夏傳位譯)。台北：巨流。
- Cook, Judith A., & Fonow, Mary M. (1986). Knowledge and Women's Interests: Issues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 56(2).
- Devault, Marjorie L. (1999). *Liberating Method: 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Sandra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Sandra (1987). *Feminism &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Sandra (1992)。《女性主義、科學與反啟蒙批判》(江珍賢譯)。《島嶼邊緣》，1(2)，7-76。
- Henderson, K. A., Bialeschki, M. D., Shaw, S. M., & Freysinger, V. J. (2000)。《女性休閒—女性主義視角》(劉耳等譯)。昆明：雲南人民。
- Morley, L. (2000). Interrogating Patriarchy: The Challenges of Feminist Research. In S. J. Ball (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 I: Theories and Methods* (pp. 236-257).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 Pamela Abbott & Claire Wallace (1995)。《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俞智敏等譯)。台北：巨流。
- Ramazanoğlu, C., & Holland, J. (2002). *Feminist methodology: Challenges and choices*. Sage Publications.
- Reinharz, 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Lynn Davidman)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yff, C. D. (1985).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Life-Span Transitions. In Alice S. Rossi (Ed.). *Gender and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Smith, D.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祝若穎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prague, J., & Zimmerman, M. K. (1989). Quality and Quantity: Reconstructing Feminist Method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20, 71-86.

Stanely, Liz & Wise, S. (1983). *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tanely, Liz (1990). *Feminist Praxis-Research,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Stanely, Liz & Wise, S. (1993). *Breaking out again: Feminist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London: Routledge.

文稿收件：2007年10月01日

文稿修改：2007年12月17日

接受刊登：2008年02月15日

# **Feminist Method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Studies**

**Jo-Ying Chu**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feminist method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studi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study was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first explored the theoretic meaning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 It included the feminist empiricism,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and the feminist postmodernism.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is considered the mainstream theory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 The study explored the meaning of feminist methodology that included the significance of female distinctive experience perspectives, the relationship of power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the people being studied, the argument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nd social change. Finally, th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studies include taking advantage of female distinctive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spect, moving the aim of research relationship toward inter-subjectivity, raising the level of diversity and trans-disciplines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praxis on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feminist methodology, feminist epistemology, educational studies.**